

田雪原

文集

THE COLLECTED WORKS OF
TIAN XUEYUAN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THE COLLECTED WORKS OF
TIAN XUEYUAN

田雪原

文集



为马寅初纪念馆题词

荣辱不重要
唯有真理高

田原

田雪原

传
略

田雪原，1938.8 生于辽宁省本溪市。1964.8 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学系，曾在教育部等国家机关工作，1979.4~1982.5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助研、副研，1982.5~1983.6 美国东西方中心访问学者、客座研究员，1984.4~1998.12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中心）所长（主任）、研究员。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专家咨询委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历任第四、五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第三、四、五、六届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常务副会长，第二、三届中国老年学学会副会长，第三、四届中国社会经济文化交流协会副会长，第一至六届国家人口计生委人口专家委员，国际人口科学联盟（IUSSP）成员等。

主要从事人口学、人口经济学、老年学研究，出版专著 35 部（含主编），主持国家重大、重点项目 6 项，与联合国人口基金、美、日等合作项目 5 项，在国内和美、日、荷、比、澳等国作学术演讲多次，受到普遍好评和重视。主要学术贡献：为马寅初新人口论翻案，引领人口理论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提出并阐释控制人口数量、提高素质、调整结构相结合“三步走”人口发展战略，为国家人口政策制定和后来的政策调整提供智力支持，当前已过渡到以人口素质全面提升为重点的第二阶段；主持中国老年人

口抽样调查，提出并阐发集社养、家养、自养于一体的养老保障体系，消除“二元体制”改革建议；提出和论证了孩子社会附加成本一效益理论，结合中国实际进行试点和理论创新；论证城市化必须打破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走以人为本、城乡协调发展的城市化道路；结合中国实际，阐发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素质提升对经济增长速度、发展方式转变的制约，实现高质量发展增强人力资本积聚是基础和关键；提出并构建人口与资源、环境、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理论框架、战略重点和决策选择。

1984 年被授予首批国家“中青年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1988 年获国家科技进步成果一等奖，1991 年英国剑桥国际名人传记中心（IBC）授予“国际知识分子名人”并在《成功的人》中作了业绩介绍，1995 年美国传记协会（ABI）载入“世界五千名人录”并作了业迹介绍，1996 年获中华人口奖（人口最高奖），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2000 年获国家图书奖，2009 年《中国人口政策 60 年》（专著）入选“辉煌历程——庆祝新中国成立 60 周年重点书系”，2011 年《人口大国的希望》（中、英文）入选首届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科研成果中，还有 10 多项获部委级特别荣誉奖、一等奖。

THE BIOGRAPHY OF TIAN XUEYUAN



Tian Xueyuan graduated from Economy Department of Peking University in August, 1964. He worked in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some other state organs during August, 1964 and April, 1979, worked on population and economy researches in Economy Research Institute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during April, 1979 and May, 1982, worked as a top visiting scholar in American East West Center during May, 1982 and June, 1983, and was the dean of the Population Institute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during April, 1984 and December, 1998. He now is a member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Consultation Committee, researcher, tutor of doctors, country's expert with exceptional contributions. His major social part-time jobs are: a member of Study Group of State Department's Degree Committee, the vice president of PSC and Society of Social Economy and Culture Communication of China, an expert member of State's Family Planning Commission, a member of IUSSP, and so on.

Since 1970s, there are 35 books he (and as the chief editor) wrote, such as *On Population of the New Period*, *Calamity of the Big Country—Population Problems of China Today*, and *Demography*, more than 500

papers (including more than 30 pieces of English, Russian and Japanese papers), such as *Exonerate For Ma Yinchu's New Theory on Population, On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Population and National's Economy*, and more than 30 research reports have been published. More than 5 millions words are written by himself. His representative works are all in *The Collected Works of Tian Xueyuan*^{1, 2, 3, 4, 5}. He has taken charged of 6 significant national projects, cooperated with 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Fund, America and Japan on 5 projects since 1980s. He created original and systematic research findings in many areas, such as, rectifying on population theory, population development strategy, population control and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community, family economy and childbirth, aging of population and social security, and popul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He has given reports in China and in America, Japan, Holland, Belgium and Australia many times, and received universal praise and recognition. He was awarded "Young Expert with Significant National Contributions" in 1984, the first prize of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dvancement Findings" in 1988, "International Intellectual Celebrity" by IBC in 1991, and his achievements were introduced in "Successful People". He was taken in "World 5000 Celebrity" by ABI in 1995, and his story was introduced in it. In addition, he was awarded "Chinese Population Prize", which is the highest level of population prize, and "Five Top" Project Prize of cultural and ethical progress in 1996, "National Book Prize" in 2000, the first prize of "6th Session Chinese National Book Prize" in 2003. There are more than 10 of his scientific research findings were honored with ministries and commissions' special prize and the first prize.

学然后知不足

——我的学术自传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决定出版我的第五卷“文集”，前四卷也要一起再版。于是总想找个合适的题目写段文字放在前面，作为迄今为止做研究工作的一个总结。《礼记·学记》中有一段颇有哲理的话：“是故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意思是说学习了之后，方能知道自己的不足；教授别人之后，才能知道自己的困惑所在。知道自己不足，方能进行自我反省；知道自己困惑所在，才能自觉奋发进取。“学然后知不足”这段话颇有穿透力，从一个特定的视角将我的学术生涯串连起来，从中理出从事研究工作的思绪和轨迹来。也像一把钥匙，打开我的一个个学术情结。

学术激情哪里来

有一次，同我的几位研究生讨论博士毕业论文写作。其中一位说道：“读田老师的文章，不仅有理论、有文采，而且字里行间总有一股激情回荡着。请问老师，你的激情是从哪里来的，怎样才能融入文章之中？”我一时有些语塞，难以用一两句话表达清楚，便说“有理论、有文采不敢当，有激情倒是有点儿渊源，我们另找时间说说吧”。下来之后，我认真思考梳理一下思绪，以讲故事说史方式，同这位同学进行了交谈。大致讲了这样的内容：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有一条未经我国许可外国人自行修建并经营的铁路，那就是安（东）奉（天）线，即现在的沈（阳）丹（东）线。日本人修建该铁路，可以更便捷地掠夺我国东北的煤炭、钢铁、石油、有色金属、木材、大豆、高粱等资源和产品，支持其野心勃勃的“大东亚圣战”。毫无

疑问，这条铁路除了担负运输任务外，也成了强迫沿线中国民众开矿山、建工厂、修道路和抓劳工、要出荷（税收）强取豪夺的工具和动脉。我的故乡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由一座煤矿和制钢所，扩展为殖民地式“煤铁之城”的。由于集铁矿、焦煤、石灰石、耐火黏土等资源于一地，以钢铁为主的重化工业迅速发展起来，中国劳工所受的苦难也日复一日地积聚加深起来。印象最深刻的是日本侵略者的大刀，刀光剑影伴随着“八咯呀路”的吼声，在面无表情的中国劳工面前回荡。当时不知道还有一个偌大的中国存在，只知道山海关外的东北伪满洲国。

为什么日本人和中国人不一样？干的活不一样，日本人拿着战刀指挥，中国人干最脏最累的苦力；吃的不一样，日本人吃的是大米白面、鸡鸭鱼肉，中国人吃的是橡子面菜团子；地位不一样，日本人说一不二，中国人却只能听从吆喝、任人摆布。1945年“八·一五”光复日本帝国主义投降，结束了中国人民当牛做马的日子。可是中国人为什么会成为亡国奴呢？这是我幼小心灵中解不开的谜团。后来上小学时，当教师的哥哥送给我一本方志敏烈士遗著《可爱的中国》——我把它称为打开我心灵天窗的第一本启蒙读物。当读到帝国主义列强宰割祖国母亲的身体、吸吮母亲的乳汁时，眼前浮现出日本侵略者的大刀和烧、杀、抢、掠惨景，再也抑制不住夺眶而出的泪水，心头充满悲愤！作为祖国母亲的儿子，立下生平要为国家富强、民族解放报国献身之志。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新中国犹如一轮红日从东方地平线上升起，结束了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被侵略、被奴役、被剥削的百年屈辱史。此后三年国民经济恢复，迅速医治了战争的创伤，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完成揭开由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的序幕。全国人民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每个人都怀着企盼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伟大理想而工作着、奋斗着。在这样的背景下，1959年我接到高考入学通知书，踏上通往首都大学殿堂的求学之路。记得那是8月30日，由沈阳搭乘156次大连—永定门的直达列车（当时车次编号在100以上均为逢站就停的慢车），用了23个小时方才抵达永定门车站。8月31日清晨火车经停山海关站，因为需要更换蒸汽机车车头而停车20分钟。听到一路上列车广播员熟悉的声音播报后，车一停便跳下站台、冲上天桥，一览长城天下第一关的雄姿！

虽然自知缺乏诗词天赋，可是心血来潮、激情难耐，还是信笔填词一首：

忆秦娥·山海关

(1959. 8. 31)

东风开，
骤雨初晴过山海。

过山海，
雄关依旧，
孟姜安在？
亿万青砖垒山隘，
乾坤一抖东方白！

东方白，
报国有门，
学子归来。

为何讲“学子归来”呢？照理，离别家乡千里入关，当有背井离乡之感才合情理。不过，对于一个童年时代根本不知道关内祖国存在，如今满怀报国志投进她的怀抱，并要到前身为京师大学堂的北京大学读书，那份真切的回归之感是他人很难感受得到的。入学后不久，正赶上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参加天安门广场游行队伍和晚会狂欢，在金水桥上唱着、跳着，少儿时代的屈辱、悲愤被歌声和欢跳带走，心中好不欢畅！

然而回到燕园，却遇到一件百思不得其解的事情：北大正掀起第二次批判马寅初校长《新人口论》热潮。这使我陷入迷茫。于是便躲在图书馆第五阅览室（期刊阅览室）一隅，找来马寅初在《新建设》杂志上发表的《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等文章，同时也找来一堆《光明日报》等发表的批判文章，对照着读了起来。读着、读着……越读越觉得老校长关于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的论述讲得颇有道理，更为他那种年近八十誓死捍卫真理、直至战死为止的不屈精神所打动；相反，那些连篇累牍的批判文章却讲不出多少道理来，除了贴标签式的政治口号和扣大帽子之外，便是偷换前提一类的逻辑推演，其目的就是要将《新人口论》批臭，把马寅初一巴掌打下去。特别受到康生亲临北大点名批判“属于哪个马家”影响，包括马老居住的燕南园在内的整个燕园，更是大字报铺天盖地，声讨之声不绝于耳，最后马老真的从北大校园、政坛和学坛上“蒸发”了。这着实使我困惑了一阵子，难道这桩公案就这样盖棺定论了不成？当时不清

楚，正是这样的认识化为一种情结，埋下后来为马寅初《新人口论》翻案和走上人口科学研究之路的种子。

1964年8月从北大经济学系毕业后，先是参加两年“四清”，接着便是所谓的十年“文化大革命”和干部下放劳动。除了和这一代人大同小异的经历外，作为系统学习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说史的学人来说，原本盼望祖国尽快强盛、人民尽快富裕起来的情结受到莫大的伤害。在“四清”与人民公社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过程中，亲身体会到新中国成立十五六年后，广大农民依然过着缺吃少穿的清贫日子；城市也好不到哪儿去，低得可怜的工资不便以“元”启齿谈论，竟以三位数“大毛（角）”戏说。直至70年代每人每月只供应几两油、肉、蛋，自行车、手表、缝纫机等日用工业品都要凭票供应，在饥饿、温饱、小康、富裕和更富裕几个发展阶段中，总体上处在由饥饿向温饱过渡阶段，相当数量的民众还停留在饥饿阶段。由此不能不对当时的人民公社以及整个国家的计划经济产生疑问：为什么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忧虑的是生产过剩，而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国家则被经济短缺所困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二三十年，我们同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不是缩小而是扩大了，国家尽快富强起来的期望跌到了失望的边缘。至于所学的知识尤其是经济思想、理论、学说，只剩下苏联计划经济那一套独领风骚、独霸天下，其余均被不同程度地划入封、资、修范畴加以批判。到头来，旧的批判马寅初的迷茫未散，新的迷茫却又悄然袭来、难以挥去，一时间真的迷茫起来了。

忽如一夜春风来

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恢复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确立，给我的感觉真的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迷茫开始散去，科学发展的春天来到了。于是即刻投身到理论战线的拨乱反正中去，开始了新的研究征程。开头在《光明日报》等发表《调整是目前国民经济全局的关键》《“大会战”是组织经济建设的好形式吗？》等几篇文章，抒发多年来蓄积于胸的经济学方面的郁闷，颇有一吐为快之感。但是最大的学术情结还是当年批判马寅初新人口论时投下的阴影，于是提起笔来，奋然撰写并发表《为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翻案》等几篇文章，从此同人口学、人口经济学研究结下不解之缘。

一石激起千层浪。为马寅初新人口论翻案一反长期困扰人们头脑的人口越多越好论教条，揭开人口理论拨乱反正的序幕。接着我又将马寅初发表的相关文章、讲话、接见记者谈话记录等，收集、整理、编辑出来，送交出版社以马寅初《新人口论》命名发表，并在短期内两次再版，产生某种多米诺骨牌效应。中央和省、区、市党政机关、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部队机关等邀请前去做报告，出现前所未有的口问题、人口研究热。在这种形势下，1980年联合国人口基金决定对华援助，人口科学研究和教学包含在其中，中国社科院人口研究中心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我服从分配到该中心。但是我原来所学专业为经济学，经济学与人口学有着某种近亲血缘关系，但是毕竟属于不同学科。“隔行如隔山”的道理提示我，要从经济学转到人口学研究必须补上这一课。机会来了，1982年5月美国东西方中心邀请我到那里作高级访问学者，进行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与社会经济发展相关研究。我则利用这一年多的时间，一方面完成研究课题，另一方面比较系统地学习了当时主要的人口学论著，并且结识了前往那里做交流访问的著名专家学者。美国东西方中心坐落在夏威夷群岛檀香山市（HONOLULU），地处太平洋中心，亚洲、大洋洲、美洲三大洲连线交会处，风景如画，既无严寒又无酷暑，每年都有众多访问学者光顾。在那里，有机会结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 A. 柯尔、芝加哥大学 G. S. 贝克尔和 F. 豪泽、布朗大学 S. 哥德斯坦，英国伦敦大学的布拉斯、日本大学的黑田俊夫、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考德维尔等大师级人口学家、经济学家，带着求知的渴望学习他们的专长，受益匪浅。

1983年6月回国后，即转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中心，将主要研究方向锁定在人口学以及人口经济学、老年人口学。按照中国社科院与联合国人口基金达成的协议，人口研究中心以院属研究机构名义对外，对内开始挂靠在社会学研究所，后转到经济研究所，实则相当于该研究所的一个研究室。1984年4月我被任命为人口研究中心负责人，1985年1月院务扩大会议将人口研究中心列为院直属单位，随后任命我为中心主任。为了与中国社科院建制相协调，1987年人口研究中心改为人口研究所，被任命为所长，创办并兼任《中国人口科学》杂志主编、《中国人口年鉴》主编，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1999年院将超龄退下行政岗位的院领导和部分研究所所长组建中国社科院学术委员会，我为第一、第二届学术委员会委员。200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成立，为首届学部委员。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从事研究的学术生涯，迄今共发表专著 35 部（含主编，其中英文 2 部，日文 1 部，英、法、俄、德、西、阿等多种外文本合著 1 部），论文 500 余篇（含外文 50 余篇），研究报告 30 余篇（部）。按时间顺序与专题研究相结合归纳，主要研究领域和发表成果的学术观点，概括如下。

1. 人口经济理论拨乱反正研究

1978 年岁末，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契机，哲学社会科学理论拨乱反正的大幕拉开了。由于本人所学专业原本为经济学，便从经济理论入手，针对长期以来忽视经济规律、国民经济比例失调、重生产轻消费、重重（工业）轻轻（工业）等撰写文章，在《光明日报》等报刊发表《调整是目前国民经济全局的关键》《为社会主义的“托拉斯”恢复名誉》等几篇。不过笔者进入拨乱反正主战场，主要还集中在人口理论正本清源、人口与经济发展方面。突破口是为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翻案。这是 20 年前凝聚的一个情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不久，便将多年积累的相关资料整理出来，拿起笔来撰写《为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翻案》，1979 年 8 月 5 日《光明日报》以近整版篇幅全文发表。近来有一位同事撰文，以我是北大经济学系毕业、当时在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从事科研和我本人具备的一些条件等为“理由”，对我撰写发表该文做出推断，认为是奉命之作。这里，我要郑重表示：我撰写为马寅初新人口论翻案文章同任何组织、任何个人都没有关系，纯属个人行为，是我郁积多年学术情结的迸发，是“蓄谋”近 20 年的由衷之作。事实上，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后不久，我的文章初稿即已完成，中间数易其稿后，送到《光明日报》社。为什么要送《光明日报》社？一是该报主要面向科教界，“翻案”一文毕竟属于学术范畴。二是当年批判马寅初时，《光明日报》扮演了急先锋角色，应当负有平反责任。稿子发出不久，报社负责同志告诉我，准备作为重头文章发表；但要等一等，先下点儿毛毛雨（发表点儿舆论性质小文章），然后再发表我的文章。发表时报社加了“编者按”，作为对过去错误批判的清算。文章发表后引来强烈反响，多家报纸杂志转载，日本厚生省全文翻译刊载，《北京大学学报》等约稿，北京出版社接连两次再版由我编辑并附介绍的马寅初《新人口论》（文集）。相关政府部门、高校、科研单位及相关省市等，纷纷邀请前往作学术报告。以此为契机，先后在《人民日报》等报刊发表几篇文章，推动人口理论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同时出版本人第一本人口学专著《新时期人口论》，香

港《大公报》发表影印书评，认为“这是1957年马寅初发表《新人口论》以后第一本全面研究我国人口问题的专著”（《大公报》1982年7月21日）。这些论著，解放思想、打破长期以来束缚人们思想的禁锢，着力推进理论拨乱反正。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一是将人口问题说成政治问题，造成人口问题长期无人敢于问津。包括人口在内的社会科学中的某些问题，往往同政治有牵连；然而二者毕竟属于不同的范畴，要用不同的方法对待和解决。批判马老新人口论时把学术问题当作政治问题批判，谁讲人口问题谁就是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这就人为地划出了一个“禁区”，堵塞了言路，致使人口科学研究中断了一二十年。在学术问题上，有时真理可能在少数人手里，只能坚持讨论的办法、民主的办法，按照“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办事。

二是片面夸大人口多的好处，用“人手论”取代“人口论”。批判中加给马老理论“罪状”之一，是“见口不见手”，只看到人作为消费者一面，没有看到作为生产者更重要的一面。批判者的逻辑是：人口越多—劳动力越多—生产越多—积累越多—发展越快，因此人口越多越好。甚至认为“人口”一词本身就有问题，为什么首先看到的是一张吃饭的口，而不是劳动万能的一双手呢？应将“人口”改为“人手”，“人口论”改为“人手论”。事实上，人作为生产者是有条件的，是劳动年龄人口中扣除丧失劳动能力的人口；而作为消费者是无条件的，无论少年人口、成年（劳动年龄）人口还是老年人口，无论能劳动还是不能劳动人口，均要消费，消费是维系人口再生产不可或缺的条件。而且，就以“口”还是以“手”计量人口数量而论，以“口”计量要更科学一些。因为一般情况下，无口之人是不能存活的；而无手、仅有一只手或一只手也没有的不全之人，尽管所占比例很低但却有微量存在，以“手”计量是不够严谨、不够科学的。

三是将人口质量与种族优生混同起来，谁讲人口质量谁就是仇视劳动人民。马寅初新人口论的基本观点，就是控制人口的数量、提高人口的质量，用他的话说，就是去掉这个大负担、保存这个大资源。批判中却将“提高人口的质量”说成是贬低、仇视劳动人民，是反动的资产阶级种族优生论的翻版。人口指居住在特定地域的总体而言，是数量和质量的统一。马老关于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的论述，可谓画龙点睛之笔，切中人口问题要害。

四是在社会主义人口规律问题上，突出人口的不断迅速增长。批判新人口论以后，更加强调人口不断迅速增长，致使这一“社会主义人口规律”

占据学坛 30 年，甚至写进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不断迅速增长”的潜台词，是社会主义不存在人口过剩问题。因此，尽管当时我国在实践上程度不同地推行节制人口的计划生育，但是理论上解释为有利于母亲、儿童健康，有利于妇女解放，绝不是因为人口多了的缘故。显然，这样的解释很牵强，有掩耳盗铃之嫌。这就形成理论与实践的背离，陷入误区的理论难以发挥指导实践的作用。只有清除这一理论教条，明确我国人口问题属人口压迫生产力，即人口和劳动力过剩性质，才能为控制人口增长提供科学的理论支持。

2. “三步走”人口发展战略研究

将人口转变理论与中国人口变动实际结合起来，提出并阐发集人口数量控制、素质提升、结构调整于一体、相结合，不同时期重点不同的“三步走”人口发展战略。收入本套文集的《关于人口发展战略问题》《2000 年中国的人口和就业》《“三步走”中国人口发展战略的理性选择》等，做出有一定创新性的研究。其中《2000 年中国的人口和就业》为《2000 年的中国》报告首篇，1988 年获国家科技进步成果一等奖。《瞭望》《群言》《中国人口报》等报刊，就人口发展战略“三步走”、重点转移等做出报道。由于学界对人口战略存在某些歧义，上述论著首先对人口战略概念做出界定，强调人口发展战略要特别注重它的长期性、全局性、阶段性。其次从中国人口和社会经济现状出发，联系现代化发展趋势，提出“缓着陆”高位预测、“软着陆”中位预测、“硬着陆”低位预测三种可供选择的方案，确立以“软着陆”中方案为主的“三步走”战略。

第一步，在“控制”“提高”“调整”协同推进中，更注重人口的数量控制，以“控制”为重点。目标是将高生育率降下来，实现人口再生产由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类型的转变。1991 年总和生育率下降到 2.10 更替水平以下，出生率下降到 20‰以下，死亡率下降到 7.0‰以下，自然增长率下降到 13.0‰以下，人口再生产叩响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类型门环，推进到第一步与第二步交会点。

第二步，逐步实现由以人口数量控制为主向以人口数量控制、素质提高、结构调整并重，再向以素质提升以及同素质提升相关的结构调整为主转变。目标是在低生育水平基本稳定条件下，推动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后人口转变”前行，直至增长势能释放殆尽，实现人口零增长。按照“软着陆”中方案预测，2030 年前后第二步可基本完成。

第三步，由于人口的惯性作用，零增长以后总体人口将呈现一定程度的